



北京科技大学校报编辑部

第 982 期

2005 年 9 月 1 日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特刊)

北京科大

回忆抗日根据地的农民
自卫战争 2 版

记抗日战争中的难忘
岁月 3 版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
到底 4 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827/G

http://news.ustb.edu.cn

E-mail: news@ustb.edu.cn

200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

60 年前,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指引和鼓舞下,中国人民团结一

致,同仇敌忾,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经过 14 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

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为实现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我校离退休的老干部、老

同志中,有许多同志当年曾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斗争,成为抗战的英勇战士,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有 6 位我校离退休老领导、老干部或是拿起笔,或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当年投身抗日的烽火岁月和动人事迹,读来令我们后人十分感动。学校离退休干部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党委宣传部将这 6 篇纪念文章在本刊集中发表,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诚望全校师生员工都能认真读一读。

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就要牢记历史,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生活。要面向未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学校新的发展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

牢记历史 面向未来

陈世禄

抗战时期的李文同志

30 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上海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李文和书店的一些进步青年投入到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担任了上海职业救国会书业界的负责人,在业余时间经常和同志们深入到工厂区去办夜校、作宣传。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李文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国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因此,他在认真做好生活书店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职业界救国会的救亡活动。李文与书店同仁们在邹韬奋的领导下坚持在上海出版发行进步图书,出版《抗战》和《全民抗战》等期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我党要求实行全民抗战的主张,无情抨击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行为。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生活书店西迁武汉,后转到重庆,李文被任命为生活书店重庆分店经理。1937 年 11 月 28 日,分店在重庆武库街(民生路)正式开业。他一面主持重庆分店的工作,一面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了由我地下党领导的青生职业互助会,经常与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在一起活动,与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38 年 5 月,他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经地下党员欧阳真(即作家杨朔)和杨修范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生活书店于 8 月召开第三次社员大会,李文被选为常务理事。

李文和他所领导的重庆分店,在异常困难和艰险的环境中度过了 1939 年。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政府当局对生活书店的打击和摧残加剧,在 1939、1940 年两年中,生活书店的许多分支书店大量图书被没收,大批邮件被扣留,绝大部分分支书店被查封,许多负责人被抓、被关,甚至有人被迫害致死,致生活书店分布全国的 56 个分支书店只存下 6 个。李文和书店的同志们,在邹韬奋的领导下,面对强暴,坚强地为正义而斗争。一次,重庆的宪警奉命到重庆分店“检查”,不仅搜去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等进步书籍,还将李文和会计华凤夏带往警备司令部,要他们交出“禁书”。李文据理力争,回答说,我店卖的书都是经过图书审查的,没有

禁书。后又经总经理徐伯昕出面说理交涉,斗争取得胜利,迫使宪警将李文等人放回。

最使李文难忘的是周恩来同志对生活书店的爱护和关怀。1940 年 5 月,周恩来从与邹韬奋的谈话中了解到,在生活书店中有一些职工不安心工作,有的想去延安,有的想另找职业。周恩来在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约李文、华凤夏和张锡荣三人谈话,亲切地向他们作了三点指示:要耐心做好思想工作,使书店同事们认识到生活书店工作就是革命工作,就是同敌人作斗争的工作;书店的中共党员要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本店职工,在韬奋先生的领导下做好出版发行工作;对国民党当局可能的更严重的打击要做好准备,为革命保存力量,要停止书店以外的其他活动。周恩来对生活书店的关怀和保护,极大地鼓舞了李文和他的同事们。

1940 年夏初,周恩来约见生活、读书和新知三进步书店负责人,建议他们派人去延安和太行山敌后,以民间形式开展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开辟新的文化出版阵地。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三书店决定联合派遣以李文为组长,由李文、赵子诚和陈在德组成的 3 人小组去太

行山。李文等欣然受命,于 1940 年 9 月从重庆出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为了安全,三人都改了姓名,李文由原名李济安从此改为李文。他们和办事处一班战士同行到洛阳,过黄河,又经长途跋涉,通过敌伪的数道封锁线,于 11 月初到达山西辽县(左权县),受到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晋冀鲁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热情接待。经过短时间的筹备,由李文担任经理的太行山华北书店在 1941 年元旦正式开业。当时太行山根据地在日寇的严密封锁下,物资缺乏,书店出版图书只能使用油印。油印所需的油印机、油墨和纸张等,李文要亲自骑着马到数百里以外的河北阳邑去采购。条件虽然困难,但书店在数月中油印出版了数十种书籍,有高尔基的《鹰之歌》,鲁迅的《呐喊》、《孔乙己》和《狂人日记》等。除书籍外,书店还印了大量日历,受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欢迎和好评。

1941 年 4 月,八路军总部接延安中央组织部电,调李文参加延安华北书店的筹备。他于 6 月初到达延安后,立即投入华北书店紧张又繁重的筹备工作,他们在延安北门外建起了三间门面的门市部。1941 年 10 月 1 日,由李文担任经理、林默涵任编辑部主任的华北书店正式



开业。书店开业后,陆续出版了大批图书读物,有国内外文艺小说、通俗读物,如《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史话》、《新三字经》、《兄妹开荒》等,还用木刻、石印印制了大批地图、年画、连环画以及“鲁艺”的木刻作品等。这些读物,满足了边区广大军民渴求精神食粮的需要,受到边区广大军民的欢迎。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延安山城一片欢腾。

此后不久,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和新解放区去工作,李文奉命到东北开辟出版发行工作。

(本文节选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江阴名贤传暨阳之星》,题目为编者所加)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离休干部 张磊民

2005 是抗日救国战争胜利 60 周年。60 年前,1945 年的 8 月 15 日,日本侵略者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轰轰烈烈的八年抗战,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我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党员,回忆记录下在那血与火的八年抗战中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些往事,无疑是个很好的纪念。

我的家乡在河北省唐县,地处太行山麓深山区的原二区古军城,这里是全国抗日根据地之一的晋察冀边区腹地。当年,聂荣臻元帅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就曾驻扎在这里,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之陵墓也坐落于此。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二十九军抵抗了一阵子,受

蒋介石的命令就很快撤退了,南撤军队在我们那里整整停留了 12 天。他们纪律败坏,溃不成军,到处抓民夫、拉牲口,见猪就杀,见鸡就捉,打人骂人,蛮不讲理,老百姓都跑光了。军队过后遍地是鸡毛粪便,垃圾成堆,臭气熏天。他们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幸福和希望,而是一场浩劫。国民党中央军虽然装备优良,但没打日本鬼子,只在我们那里晃荡了几天就望风而逃了。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紧要关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迅速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首先到达我们那里的是——一五师骑兵营(当时还称红军),他们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英勇作战,纪律严明,办事公道,待人和气。老百姓都回来了,为他们铡草喂马,安排住处,烧水做饭。当日本鬼子快到我们家乡时,他

们“倒马关”一仗就一举把鬼子打退到走马驿,消息传开后,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真是神兵天降,救国救民的好军队,人民有了依托,抗战有了希望。

接着他们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了抗日救国动员会,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从此,抗日新政权成立了,继而各村组织起民兵自卫队、儿童团、妇女救国会,站岗放哨查路条,村村传送鸡毛信,做军鞋、缝军衣、抬担架、送公粮。抗战初期的义勇军,逐步壮大成人民子弟兵正规部队,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鱼水不能分。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战民歌《在太行山上》中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 下转第四版

新闻 热线

62332303

本版责编:李 伟
校 对:李 伟
版 式:徐 健

1945 - 2005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年了。6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今天，我享受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抗战时期那些艰苦的战斗历程，却时时浮现在眼前。

抗战爆发时，我叔叔在唐山煤矿做地下工作。他是共产党员，是我最尊敬和亲近的人。1938年，我16岁，在叔叔的指引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说实话，那时我对党的认识仅仅来自叔叔的言传身教，实在谈不上有多么深的理论知识。但我入党的信念是很坚定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

我住的村子叫上河村，隶属河北省曲阳县。不到20岁的我先后担任了村里的锄奸团（即后来的治安团）团长和村民政主任，主要负责村里抗日军属的生活。

1942年春天，日寇占领了整个曲阳县，上河村的四周都修上了炮楼，村子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中。在我们村驻扎的日军有一个班，十多个人；伪军警备队一个小队，四个班。一天，警备队的班长张志国到村里来找人到炮楼给日本人烧火做饭。村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让我去。我想起日军在村里的所作所为，一口就回绝了。我气愤地说：“他们在村里像强盗一样，我还要去伺候他们，那不成汉奸了吗？”村支书陈月立和搞地下工作的李振清同志找我谈话，说：“让你去，名为烧火做饭，实际上是打入敌人内部，为党提供情报，配合抗日工作。”我终于明白了党支部的意图，原来的情绪一扫而光，只觉得热血沸腾。我又做通了父母

难忘的战斗岁月

离休干部 李双禄 口述

的工作，他们虽然为我担心，但深明大意的他们还是含泪把我送到村口。

在魔窟里工作，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寒冬腊月，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日本鬼子稍不顺心就拳打脚踢，而我只能忍受。有一次，一个日本兵看我挺结实，就提出和我摔跤，开始我不同意，他硬要摔，没办法，我便和他在场院上拉开了架式。我心想要给他点颜色瞧瞧，第一局，便使出浑身解数，结果他输了，被我摔倒在地上好半天才爬起来。我看他的脸色有些不正常，眼里露出凶光，心想，要是把他惹恼了，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于是第二局第三局我便故意输给他，他高兴极了，拍拍身上的土走了。我摸着摔得生疼的骨头，心里暗暗地说：“总有一天叫你们全完蛋！”

在炮楼里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渐渐了解了那里的情况。一方面我把日伪军的动静报告给党组织，另一方面我在心里悄悄地策划怎样从内部瓦解敌人。据我了解，伪军中有好多人其实是不得已才为日本人做事的，他们是一支可以争取的力量。我经常跟张志国聊天，都是苦孩子出身，相同的经历使我渐渐得到了他的信任。他说：“小李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是中国人，

帮日本人杀自己人我心里也不好受，当汉奸是身不由己啊。可是就算我想回头，共产党会接受我吗？”我不断地向他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打消他的顾虑。在我耐心的劝说下，终于有一天他找到我，郑重的向我表示说：“我想立点功。”于是，我俩就一起分析、选择工作对象，给其他几个人做工作，渐渐地，他们也向我们靠拢了。我向李振清同志汇报了起义的打算和准备工作的情况，他表示非常支持，并在一个深夜带着几名八路军来到炮楼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八路军的宣传让他们很受触动，纷纷表示要脱离伪军，支持抗日。在做好了组织工作之后，我们开始着手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后来我们趁大部分日本兵开拔到别处，只剩下几个日本鬼子和一部分伪军时动手。李振清同志还从区里调来了部队支援我们。一切准备就绪。

二月初三凌晨，按照计划，我在办公室等消息并作掩护，张志国带领几个人潜伏在炮楼。大概过了几分钟，就听见一声枪响，我几乎冲上炮楼，只见那两个伪军小队长都五花大绑地跪在地上。那个小队长吓得面如土色，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不停地求饶说：“胆子爷（我的绰号），饶了我吧！”我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宽大的，

只要你跟我们走，咱们以后就是朋友，要是你反抗，那就送你进阎王殿了。”他们纷纷表示，当汉奸并非本意，从今以后，愿意脱离伪军，跟着共产党走。于是，第二天，我把他们交到30里外的军区司令部，为此，我得到了嘉奖。

第一次起义成功了，大家都很高兴，酝酿起了下一个行动计划。没想到，我们的行动激怒了日军。一天早上4点多，日军包围了村子，把全村的人集中到一个场院里，逼着村民们交出共产党和八路军。春寒料峭，在刺骨的寒风中，面对敌人明晃晃的刺刀，所有的人都沉默着。敌人在村里展开搜捕，最后在一户农家的灶台里抓到一个游击队员。日军把他带到场院里，当着全村人的面，一刀便把他刺死了。年轻的游击队员壮烈牺牲了，那年他还不到二十岁。鲜血流了一地，渐渐结成了冰。后来，日军还烧了几个共产党员家的房子，把村子洗劫一空。

这次起义是我第一次真正参与到革命战争中来，所以战斗的经历到现在仍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在后来的几年抗战岁月里，我和战友们一起跟敌人斗智斗勇，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能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我是幸运的，更多的人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洒在了战场上。这其中，有我的亲人，有我并肩作战的战友，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同志。他们的音容笑貌始终鲜活的留在我的记忆中，使我永生难忘。（杨 丹 撰稿）

回忆抗日根据地的农民自卫战争

离休干部 渠刚生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霸占全中国，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不到一个月，华北地区全部沦陷。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冀西以五台山地区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的家乡就在冀西保定地区唐县三分区坛下辛庄村。

日寇占领华北控制京石铁路干线，一路烧杀抢掠。1938年正月，突然包围望都县南子村，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杀害群众84人，烧房500间，大火一月未熄。1939年10月，日寇在望都县东薛庄村又制造了一起大血案，杀害我县干部260人，杀害村民30人，烧房77间。两起大血案离我所在的五坛下村只有30华里。占领唐县的日寇头子荒井大队长、特务头子侯藤为了封锁八路军山区根据地，沿铁路挖封锁沟、修炮楼，从唐县到完县横贯两条封锁沟，三里、五里修一个炮楼。封锁沟深两丈宽两丈。炮楼有两层楼高，方圆30米，可住一排人。日寇的这些工事都是强迫农民去干，农民受苦受累不算，还要挨打受骂。

共产党毛主席抗日救国态度坚定，行动迅速。1938年5月，抗日救国工作队就来到我们村庄，队长是杜增福、孙荣贞。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纲领，教育群众认清形势，划清敌友我界限，树立抗日救国信心，号召全民皆兵，军民团结起来，不当亡国奴，开展人民战争。八路军、县区干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转入地下坚持工作，指挥部就隐蔽在乡村活动。

工作队边宣传边抓组织工作，为了增强战斗力，把辛庄村、冯家村、仰家村、许王庄村等五个村联合起来通称“五坛下”，实行互帮互助。各村设村长，成立农民抗日协会、农民抗日自卫队、民兵队、妇救会、儿童团、青抗先、锄奸组。我积极协助工作队工作，担任民兵队长、锄奸组长。

旧社会农民受地主的剥削，缺吃少穿。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毛主席制定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让农民生产自救、轻装上阵。工作队还办夜校，帮助农民学文化，学习抗日救国的道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在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农民自卫战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生产互助组，抗日救国生产自救。

（二）组织通信联络站送情报。没有交通工具，就村连村、区连区，靠农民跑步接力送，重要的机密信件要插鸡毛，叫“特信”或“鸡毛信”。送信的任务主要由“妇救会”和“青抗先”负责。为了安全，都要隐蔽化装进行。

（三）开展农民党支部活动。王全德是我们五坛下许王

庄党支部书记。他抗日救国立场坚定，机智勇敢，信息灵通，善于联系群众，熟悉农村情况，是农民的主心骨，也是情报网站和堡垒户。抗战期间，我们支部发展了几十位党员，我是其中之一。

（四）以党员为骨干建立农民自卫队。参加反“扫荡”、反“三光政策”、反“封锁”、搞村落战。各村联合行动，破坏敌人的交通，炸毁桥梁，收割电线。京石铁路边上的南子村农民自卫队在一个月间破坏铁路十二次，收割电线一千余斤，使敌人火车七次出轨，大大鼓舞了农民的士气，打击了日寇气焰。

（五）护送八路军、干部夜过封锁沟。敌人妄图以“封锁沟”隔断平原与山区的联系，将八路军、县区干部困死在山区。但是我们搞人民战争、全民皆兵，“封锁沟”挡不住军民的联合行动。一年几次过沟，每次都是军民联合行动。半夜三更时，我们紧急填平一条过沟的路，在护送八路军、县区干部安全过沟后，我们再去迷惑敌人，做个假汇报，瞒天过海，以保全自己。

（六）虎口夺粮和送公粮。从平原到山区，敌人的封锁线、碉堡群步步为营。我抗日的八路军、县区干部不能没有粮食供应。农民一年两季麦，要通过封锁线给八路军送去。每次我们都事先进行周密的组织安排，村落间联合行动，八

路军派兵暗中保护并安排内线，做好炮楼内日伪警备队工作，暗中给予配合。当一切都准备停当后，农民便在深更半夜填沟铺路，每人背四、五十斤粮食，五里路一换人，接力送到山区根据地，只有到达目的地，揪到嗓子眼的心才能撂下。抗战的八个年头年年如此。

（七）开展地道战。1940年以后敌人开始大扫荡，拉网式的搜查，进村抓人，烧杀抢掠。面对敌人的暴行，县区干部马上组织农民挖地道，男女老少都行动起来了，白天搞生产种地，到了天黑开始挖地道，分工包干到班组，挖完了就帮别人挖，挖出来的新土还要掩藏好，防止日本鬼子发现。地道一般深1.8米，宽1.5米，村连着村，户连着户，五坛下五个村都互相挖通，有七、八里路长，曲曲弯弯。地道口很隐蔽，有的通水井，有的通灶头，还有的通村外田头，为了防毒防水，在拐弯处修翻口加暗门，地道口绝对保密，由民兵监管，和电影《地道战》一模一样，给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有一次敌人到固现村抓人，固现村的民兵就从地道跑到我们辛庄村，与我村民兵联合与敌人斗智斗勇，我们使用调虎离山的游击战术，在村外放枪放炮，假装是八路军来了，吓跑了鬼子兵，保全了自己。

（八）安排内线，监视敌

情。农民锄奸组在党支部领导下，摸底调查，清除汉奸特务，培训抗日积极分子，利用内线打入敌人炮楼内部，做日伪人员的策反工作。我村附近有三个炮楼都有内线。为了保证区县干部、边区干部的人身安全，过封锁线时，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接送。后来敌人又想出新花招，他们在炮楼里值班，又强迫农民给他们在炮楼外站岗放哨。农民就借此机会与八路军联系好送“信号情报”，如：“拍手”就表明敌人有活动，“咳嗽”表明敌人睡下了等等，这就是将计就计、敌为我用。

八年抗战，遵照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无数革命青年，参军、参干、抗击日寇。我的两个弟弟参加了八路军。我从一个普通的农民成为国家干部，如今享受厅局级待遇。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荣誉，我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现在离休了，我仍然每天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年轻人的成长，支援灾区，同时注意坚持锻炼身体，带领离退休老人打门球，每天生活非常愉快。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做一个政治坚定、与时俱进，永远保持光荣革命传统的共产党员。

本版责编：张秀云
校对：张秀云
版式：徐 健

记抗日战争中的难忘岁月

离休干部 于树德 口述

我叫于树德，1920 年出生在穷苦人家，祖上好几代都是给地主种田的农民，受地主的剥削。祖辈上有的因劳累过度吐血而死，还有的还被打得头破血流。我爹说宁愿讨饭也不给地主干了，到我时家里已经靠讨饭生活了。

我 1938 年参加革命工作，1940 年 5 月，经区委书记王吉光 and 一位区委委员的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入党之初，我继续负责联系群众的工作，帮助困难人家，同时收集情报，并与同志们在沂蒙山、枣庄一带做宣传工作，号召群众同汪精卫的投降主义做坚决的斗争。

1943 年，我的家乡沂蒙山也来了日本兵，到处建据点、建炮楼，搞“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人、放火、强夺、强奸，干尽了没有人性的事情，老百姓简直没法生活。看到日本鬼子的种种暴行，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真是恨之入骨。

1944 年春，党组织送我去延安学习，在延安的学习虽然只有一周时间，但学到的东西却是我一辈子的财富。我记得毛主席说过：“人啊，就几条原则要坚持，政治思想上要健康，生活作风上要正派，为了老百姓要不怕死。”从此，这辈子我就记住了两条：“对党有利的东西，不管多大的代价都要去做；为了老百姓我可以拼命！”从延安学习回来后，我当上了民兵队长，后来又成为县武委会主任。

我们在敌后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故事多得说不完，我只讲其中几个。

和鬼子斗智斗勇

那时我们的武器装备很差，我们就利用晚上打炮楼，夺取敌人的枪支武装自己。我们把鞭炮放在铁桶里，点燃以后噼噼啪啪直响，鬼子吓得直喊：你们是谁？不要打枪！我们说：“我们是老三团的，快交枪！不然我们就放炮了！”打一个炮楼就夺鬼子们的一批枪，就这样，我们民兵的枪支越来越多，

多了，还超过了当时主力部队的枪支数目。

后来有个汉奸特别的坏，把我们的办法告诉了鬼子，鬼子气得直骂：“他妈的，穷民兵，没枪用鞭炮来唬我们。”我们又来了个实的，先用鞭炮放一通，然后真放上一炮，鬼子没防备被打了个正着！

就这样，我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有时白天也打冷枪，搞得鬼子天天提心吊胆无法休息。于是鬼子又利用汉奸打击我们。一次，鬼子从一个姓张的汉奸那里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计划，他们就提前做了准备，结果我们牺牲了 20 多个民兵。同志的牺牲更激发了我们对鬼子的仇恨，大家都说一定要消灭更多的鬼子，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于是，我们就在一个特别黑的夜里去“背死狗”。“背死狗”就是用绳子从背后勒住鬼子拖走解决掉。那会儿敌人站岗都是一个鬼子和两个汉奸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什么都不怕。我勒住一个比我高不少的鬼子狠命往外拉，他都吓破了胆，一旁的汉奸不停地求饶。

斗汉奸

汉奸最坏，不帮着打鬼子，还偷着把我们的情况告诉鬼子。因此，我们在打鬼子的同时，也必须除汉奸。有不少汉奸是因为怕死才帮鬼子干事的，对这一部分人我们尽量争取他转变立场。我们找他本人谈话，也发动他的家属帮助我们一起做思想工作，争取了不少的人。在我们晚上打炮楼时，他们不告诉鬼子，有时候还能给我们传递一些信息。

我有一个叔伯舅舅姓吴，是当地一个有名的汉奸，给鬼子通风报信，迫害我们同志，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组织上考虑到他不是很了解我的情况，又是远房亲戚，所以派我带人去除掉他。我找到他后，告诉他我手下有一批民兵，

想跟他一起干，他一听很高兴。我约他晚上在山上一间屋子里具体谈谈。那间屋子周围是大片的树木草地，他比较警惕，带了六七个人，还让他的人在屋门口和四处守着。但他没有想到，我们事先就埋伏好了，他一来就已经落入我们的包围圈。等他反应过来，早就晚了，大家一拥而上把他和他带来的人捆了个结实实。后来就在我们那儿的西沙河把他处决掉了。

不光是铁杆的汉奸要除，我们内部也不能有奸细藏身。我曾经参与抓住一个暗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交给了组织上。

老百姓高涨的抗日热情

鬼子的“三光政策”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支持抗战、投入抗战，我们的游击战在老百姓的支持下也越打越漂亮。

记得我从延安回来时给地区的民兵代表大会闹过一个笑话。那时候我年轻，大家也不认识我，大家以为是县长给他们开会，能发枪打鬼子。我上台就说：“我是县长……”，还没说完，大家都使劲地鼓掌，我好不容易等到大家平息下来赶紧说：“我是县长派来的……”大家都哈哈大笑。我说：“今天我们不能发枪！”这下，没人笑了，大家一下都急了，有几个性子急的站了起来，我一看压不住了，赶快补充“不发枪，是不可能的！”大家才陆续静下来，我拿起一杆木枪说：“我们发木枪，学会端枪近距离作战，上了刺刀就可以和鬼子打。毛主席号召咱们夺鬼子的枪，鬼子那儿就是咱们的武器库，以后咱们夺了鬼子的枪，就有真枪用了！”大家一片掌声，脸都激动得红红的！开完会我出了一身汗，但是心里特别激动。老百姓抗战的情绪多么高涨！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老百姓掩护队伍，配合部队挖地道，埋地雷。鬼子来村里抄家，有的人家在门里头拴上手榴

弹，鬼子一推门就爆炸。老百姓知道鬼子爱抢鸡吃，就在鸡爪子上弄上机关，鬼子冲上去抓鸡时，一下能炸掉三、四个鬼子。还有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装成大姑娘从路边跑过去，鬼子见了就以为是姑娘，追来追去就追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一个也跑不掉。

后来鬼子常常草木皆兵，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连开车都开在路中间，不敢压旁边的土路面，生怕有炸弹！

难忘战友情

我当县武委会主任时，身边有个小跟班，姓张，其实比我还大两岁，个子挺大，大家都叫他张大疙瘩。他不是党员，和我特别亲，我到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最开始是因为跟着我有吃的，我也让他帮我干一些联系群众的事情，后来就积极参加打鬼子的战斗。

有一次我带他去打鬼子的炮楼，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特别激动。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坡下头，还没说行动，他突然一下窜起来要往前冲，鬼子看见了，马上向这边放枪。我急了，一把把他拽回到坡下，他的帽子被打飞了，好险，再往下一点就打着脑袋了！那次之后，我俩的感情就和亲兄弟一样，“背死狗”他也要一块去，张大疙瘩可是“背死狗”的一把好手。

1973 年，我回沂蒙山见到了他，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我掏给他一百块钱让他注意身体，他还拉着我的手说：“没啥事，你要保重。”可过了一年他就去世了。张大疙瘩，我想你啊！那些和我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基本都不在了，介绍我入党的老领导王吉光也在一次扒敌人的铁路时牺牲了。

抗日战争过去 60 多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领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会忘记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不会忘记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王 研 撰稿）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无为县东乡，地处长江之畔，在皖中地区有“鱼米之乡”之称。每逢春夏之际，风和日丽，细浪拍岸，垂柳轻扬，青绿的麦苗一望无际。其间，一片片金黄色的菜花鲜艳夺目，引来无数的蜂蝶在花间飞舞。然而，日本鬼子的入侵打破了这一美好的和平景象。

1937 年，日寇先后两次对无为县进行狂轰滥炸，而后占领了无为县。江边集镇上都设有日军的据点，国民党军队不抵抗就撤走了，百姓遭屠杀、受蹂躏，四处逃亡求生。沿江据点里的小股日军出没不定，经常上岸骚扰百姓。每当听到咚咚的响声，就知道是日本鬼子乘着汽艇出动了，大人小孩都惊叫着：“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快跑呀，快跑呀！”，这样一个村传一个村，大家一起到青纱帐或远处的野地里躲藏起来。鬼子进村后，就找“花”姑娘、抢鸡鸭、烧房屋，见到来不及逃跑的老弱病残百姓，就杀死取乐。这些毫无人性的野兽走后，村庄里大火冲天，哭声震天动地。

日寇作恶多端，同时在中国

人民的心中深深地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那时有民谣：“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鬼子杀干净，海水也洗不尽我心头之恨！”充分反映出中国人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心情。

就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难的时刻，1941 年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于 1 月 18

对磨擦的斗争。那时斗争环境非常艰苦，衣食靠人民，武器装备极少极差，在战斗中向敌人要！就像《游击队》歌里唱的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游击健儿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村儿童团就常唱这样一首歌：

三个正规旅。抗日的群众组织也如雨后天春笋般成立起来。村村都成立了民兵、农协会、妇抗会、儿童团等。为了进一步扩大和联合抗日力量，由当地的工商界、有名望的开明士绅、民主人士等组成参议会，协助民主政府共同对敌。

1944 年春，皖江行署组织数

十旅）文工队召开联欢会，表演了节目，对民工进行慰问，其中有首合唱歌曲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歌词是：

“我们战斗在大江，战斗在大江

茂林血战七天七夜，冲破豺狼，苦难中生长

英勇奋斗奔向敌后方，苦战大江南北，威名扬

新四军第七师，渡过千险和万浪

反磨擦反扫荡，越战越强……”

抗日战争后期，是皖江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时期，加上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8 月 15 日，日寇投降，老百姓欢喜若狂，解了心头恨，雪了民族耻，期望今后的日子更加美好。

但形势在不断变化，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后，中央决定撤退皖江根据地。从此，坚持敌后，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第七师，又走上了新的征途。

本版责编：张秀云
校对：张秀云
版式：徐 健

我们战斗在大江

离休干部 韩文植

日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近万人被围歼殆尽。经过茂林地区的七天血战，突围逃到无为江北的干部、战士仅剩数百人。党中央于 1 月 20 日向敌后坚持抗战的部队发布命令，恢复新四军的番号，重建新四军军部，并整编成七个师。我们家乡的新四军第七师就是由原来坚持在敌后的无巢一带游击队和皖南突围出来的数百人组成的。他们继续坚持在敌后抗击日寇和反

新四军呀好比一条鱼，老百姓就是长江的水
鱼在水里游来游去，离水的鱼儿呀难得活

皖江根据地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经过几年的军民浴血奋战，军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形势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全国敌后巩固的十几个根据地之一。部队由原来的一千多人，发展成师部直属领导下的十九、二十、二十一

十万民工，重修无为东乡黄丝滩大堤（现该堤名为惠生堤，以纪念当年在北撤途中英勇牺牲的行署主任吕惠生同志），这是当年根据地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五月竣工后沿江人民欢天喜地，发自内心的感激人民政府。他们说：“黄丝滩堤是我们的亲娘，是我们生存的保障，民主政府爱人民，我们感谢共产党。”

为庆祝黄丝滩大堤完工，七师政治部文工团和皖南支队（二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上接第一版

就是当时的真实情景。

1938年，我还在高小读书，当年冬季还未毕业，年仅16岁，区里就把我调出，去任轮回教师、小学教员。那时，我深感文化水平低，能力差，总想继续深造。1939年春，冀西民族革命中学成立，几经周折我进入该校学习。这是一所抗大式的学校，专员张冲担任名誉校长，教员多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的。全校学生共一千多人，完全实行供给制，夏天发单军装，冬天发棉军衣，日常学习生活军事化。在这里我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得到了党的培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开始有了政治灵魂。

1940年1月，我从民族革命中学毕业，时年18岁，分配到本县大山村仍任小学教员，环境不同了，我也有了质的变化。大山村在山里是个较大的村庄，这里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是有名的顽固落后村，村里不仅有大地主，还有国民党的政治要人，县国民党书记就住在村中。村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持观望态度。老实说我能去该村教书并能站住脚，完全依仗着共产党八路军绝对的政治威信。那时教书没有任何报酬，吃饭由学董指派去各家吃轮头饭，白天给小学生上课，晚上还要为村民开办政治夜校和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这个村没有党支部（原有党支部因混进了坏人被迫解散了），因此我在教学的同时还要负责发展党员，开辟党的工作。那时发展党员是秘密的，党组织不公开。党员发展多了，经区委批准，就成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

1941年1月，蒋介石策划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又制造了千古奇冤“皖南事变”，给我新四军以毁灭性打击。村中国民党顽固势力幸灾乐祸，蠢蠢欲动，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蛊惑群众。针对这股逆流，我们党支部及时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围陷我江南新四军的真实情况，宣传我党我军顾全大局、团结抗日的丰功伟绩，有力回击了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

同年秋天，鬼子进行了突如其来的大扫荡。一次，我隐藏在距敌人只有四五米远的稻田里，情况十分危急，我把重要的文件埋在土里，手中攥着唯一的一颗手榴弹，心想：鬼子你靠过来，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所幸未被敌人发现。

1942年3月，我调到三区区委专职做党的工作，然后又调到四区，曾任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1941~1943年，抗战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由于形势变化，国民党消极抗战，继续反共，日本侵略军由在正面战场以军事打击为主，转为对国民党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为适应太平洋战争的需要，抽调重兵加强对敌后的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敌人在连年大扫荡中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根据地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许多被抓的群众不是被枪杀就是被刀砍，一个个惨案层出不穷，连婴儿也未能幸免。在刺刀逼迫下，有的老乡连同孩子一起跳下山崖，没摔死也被敌人滚下去的大石头活活砸死，房子烧的连猪窝也不剩，粮食、衣物全都被烧、被抢了，广大群众少吃、无穿、无住，生活十分困苦，加上连年的旱涝灾害，敌后军民的物质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一粒粮食也没有，有的村庄连稻糠野菜也没有吃的，树叶都吃光了，依靠救济也只能是一把烂菜叶子，大人孩子个个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走路有气无力。军队和地方干部只能喝上黑豆汤，区干部下乡派饭时，村干部很为难，即便能填饱肚子，排便也很困

难。夏天只有一条裤子穿，脏了，中午去河滩洗洗，晒干后再穿上进村。

困难没吓倒共产党人。有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要随时准备进行反扫荡。按照上级党委统一部署，既要组织领导群众生产自救，又要加强民兵组织建设，提高战斗力，民兵既种地，又要随时准备战斗。那时有一首歌叫《战斗生产》，大意是“战斗生产，战斗生产，晋察冀的人民越打越勇敢，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敌人来了就坚决地打，敌人扫荡也坚持生产”。

要度过难关，最关键的是要抓各村党支部建设，使其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支部建设成摧不毁、打不垮的战斗堡垒。为提高民兵组织的战斗力，在反扫荡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效地杀伤、打击、扰乱、牵制敌人和保护人民群众，除广泛采用“麻雀战”、“地雷战”以外，又增加了“地道战”，要求有条件的村庄都要挖地道，各村的制高点要设置瞭望哨、消息树，便于引导群众转移。“地雷战”中除了用“铁雷”又增加了“石雷”及一切可利用的爆炸装置。敌人来了，爆炸小组要在各交通要道、村边路口埋下地雷，村中的井台上，水桶底下，家中的箱子柜子，门扇上边也有“挂雷”、“拉雷”，使敌人防不胜防。在巨年的反扫荡中，“地雷战”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炸得敌人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心惊胆颤，使敌人尝到人民战争的厉害。连敌人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青虚山周围地区的“地雷阵”，炸得他们提心吊胆，寸步难行。

1943年“五一”大扫荡开始了，这次敌人更加狡猾，调集重兵对我内地局部地区，分若干路进行拉网式的反复扫荡。为了寻找我主力部队决战，消灭地方抗日武装，他们采用了“长距离奔袭，铁壁合围”的战术。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无法知道敌人从什么方向来、什么时间来，哪个村有敌人，哪个村没有敌人。村与村、村与区、区与县的联络完全中断了（那时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形势非常严峻，只能依靠各村按着自己的有利条件，寻机出击，在扫荡空隙抓紧埋设地雷，消灭来犯之敌，区干部也分散到各村一起参加反扫荡。

白天有瞭望哨、消息树，监视敌人活动，传递消息，但夜晚就不好办了，而敌人往往是夜间行动。一天早晨，太阳还未出来，刚吃完饭便发现区委所在地被敌人包围了，我一边组织群众转移一边向山上爬去，山越爬越高，敌人越来越近，爬到一个山崖转了过去，山下边就是吉祥庄村了，当我快爬到山顶时，有一股敌人已经窜到山尖了，情况十分危急。突然我发现一个山洞（这个洞我现在还能找到），洞口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人只能爬着进去，洞深3~4米，一眼就能见到头，洞内有一井筒式的立洞，约6~7米高，边上还有一个叉洞。我用力爬了进去，急中生智，脱下衣服将脚印抹掉，向立洞爬了上去。上边又有一个大膛儿，前边还透点亮。其实，当地老乡们早就知道这个洞，已有3~4个人钻在里边了。我告诉他们，敌人就在后边，快来了，不要说话。我带着一支“二八”盒子手枪蹲在立洞口上，敌人若往上爬，就跟他拼命。就在这时，藏在叉洞的两个老乡害怕了，小声喊：“上面有人吗？快把我们拉上去。”我用力把他们一个一个拉了上去，其中一个人要拉肚子，怎么办？我告诉他往鞋里拉，不要再说。时间不长敌人就来了。洞前是一片小草地，他们停下来，只听一个伪军大声喊叫“洞里有没有人？快出来！不然就放

毒瓦斯了。”其实敌人只是瞎诈唬，他们也不敢往里钻。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伪军用枪托戳老百姓的凶狠声音。我强忍胸中怒火，心想：这些狗汉奸，你也是中国人人生中国人养的，你们为虎作伥，帮助日本鬼子残害老百姓，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接着听见妇女痛苦的惨叫声，我以为是杀人了，过后才知道是敌人在光天化日下强暴妇女。不久，听到山尖的鬼子叫喊“开路，开路”，随后敌人就走远了。约摸过了1个小时，估计敌人下山去了，我告诉乡亲们，我先出去看一下，不回来你们不要出去。我趴在山头往下看，下面就是吉祥庄村，但吉祥庄并不吉祥，村边的石灰窑冒着白烟，隐约还能听见老百姓的惨叫声，村里冒着黑烟，被鬼子点着的房子正在燃烧。过了许久，我们才下山回村，到处是一片恐怖：漫山遍野都是被害同胞的尸体，有的是在山崖上被刺刀刺死滚下山的，有的是在石灰窑里被集体烧死的，有的是用绳子绑着扔到井里淹死的……这血淋淋的场面让我惊呆了，难道这就是敌人大肆叫嚣的所谓“王到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的共存共荣”吗？在这次反扫荡中我和乡亲们渡过了同生死共患难的一关，也亲眼目睹了敌人的残暴。

还是1943年，敌人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秋季大扫荡，继续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到处残害我同胞。据记载，仅河北省阜平县平阳村一带，就有男女老少七百多人被杀害，烧毁房屋五千多间。我抗日军民在反扫荡中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这年秋天，敌人为了推进蚕食政策，在我区南唐梅村山顶上修筑了炮楼。唐河沿岸及五唐梅各村的稻子长势喜人，令敌人垂涎三尺。稻子熟了，敌人开始抢粮了。县委指示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反抢粮斗争，保卫秋收。白天敌人用汽车拉稻子，夜晚各村群众在区小队掩护下，抢打抢收，虎口夺粮。

几天时间，秋收完成得差不多了，我和区小队的同志一起回到了白合村，这里离敌人炮楼只有五六里地，晚上吃过饭就和区小队的同志在大店的炕上睡着了。天快亮时，我醒了，刚说了声“可睡了一夜好觉”，就听见村外响起了枪声。我马上意识到是被敌人包围了，立即叫醒同志们赶快突围。敌人从东面来，我们只有向北面突围，北面村口发现了敌人，又往西边冲，西边村口也有了敌人，只能又往南边冲。南边是唐河，水齐腰深，我和区小队以最快的速度冲了过去，这时村边大麻子棵底下，已经藏有敌人，只是天还不亮，敌人没有防备，等我们过河时，敌人看清我们是区小队，立即用迫击炮向我们射击，炸得河水窜出二三丈高。跑了大约三四里地后，过了河南村脱险了才松了一口气。这次突围中，区小队副队长，二团政治干部老贾同志未能突围出来，几经隐藏险被敌人发现，直至傍晚才与我们在区政府所在地父子山村会合。这天敌人还出动

了飞机来包围区小队，结果他们什么也未捞到，扑了一场空。

1944年，冀晋区党委成立。10月间我被调往区党委组织部工作，王平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昭任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同住河北省阜平县史家寨的窑洞内。冀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五个专区），包括京西门头沟一带（也是抗日老根据地）。区党委与军区政治部住在一起。1945年8月15日夜，当王平同志宣布“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的消息时，全体军民立即沸腾起来，抗战8年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可以过太平日子了！跳啊，唱啊，笑啊！兴奋了一夜。过后，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区党委组织部向东北解放区、华中解放区大批调遣输送地方干部（包括勤杂人员）的工作开始了……。

抗日救国战争，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伟业。回顾这一历程：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高瞻远瞩，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肩负起了抗日救国的重任。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收复国土，开辟抗日根据地，组织并发展了人民战争，抗击了日本侵略者。是党中央毛主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团结了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中国共产党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极其残忍地屠杀我同胞的罪恶历史。血火8年，中国军民共伤亡了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人民同样也是侵华战争的受害者。目前，日本国内有股右翼势力，想否认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公然通过了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人们不禁要问，日本政府究竟想要干什么？历史是篡改不了的。日本侵略者自“九一八”事变后，就把屠刀伸向我国领土，随意残杀我爱国同胞，我们没有去日本一兵一卒。日本右翼势力倒行逆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食其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

我们也永远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国家落后人民就要挨打，国家落后人民就要被欺凌。我们必须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震慑一切敢于来犯之敌。我们要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才能永远安居乐业。



追忆烽火岁月

珍惜和平生活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本版责编：李伟
校对：李伟
版式：徐健

离退休干部处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共办
党委宣传部